
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

——基于对宋孝武帝朝政治、文化变革的考察

何良五

内容提要 相对于东晋门阀政治来说，南朝时期的皇权处于振兴过程当中。宋孝武帝是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君主专制，削弱士族的政治权力，极大地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同时加强对文化的统治和管控，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取得独尊地位。谢庄于孝建年间屡辞吏部尚书一职，是为了应对宋孝武帝的政治变革，其更深层的政治背景则是南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剧烈冲突。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表明高门士族在政治上失利后，进一步在文化上向帝王妥协，这也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南朝皇权振兴对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从谢庄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可见这种影响之一斑。

关键词 谢庄 宋孝武帝 政治抉择 文化变革 文学创作

从东晋到南朝，政治上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田余庆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而南朝则回归到皇权政治^①。然而皇权政治的回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宋文帝虽诛除傅亮、谢晦等辅政大臣以自掌权威，废黜彭城王义康以削弱相权，然而仍旧依靠若干高门重臣，士族势力仍盛。孝武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臣下之权，并且以严厉的杀伐措施来对付士族。皇权回升与士族权力之冲突，至孝武帝时渐至白热化，以致流血事件频发。谢庄在孝武帝起兵时立有大功，孝建初即被授以吏部尚书这一要职，然而谢庄多次因病以求解职，终被免官。孝武帝即位之初，谢庄颇有用心事之心，大明以后，虽在高位而远离权势。与此相反，谢庄在文学上则表现活跃，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要更好地理解谢庄的政治抉择与文学创作，须将其置于宋孝武帝朝的政治、文化变革当中，并从纵向的，即南朝皇权与士权的变化关系来看。南朝帝王与士族的政治、文化关系处于消长变化之中，这一变化对南朝士族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宋孝武帝朝正是这一消长变化的关键期，谢庄亦处于南朝士族文学转变的关口。

一 宋孝武帝朝的政治、文化变革

东晋南朝往往被视为一个整体时段，然而两者在政治上其实具有很大的区别。东晋可以称为门阀政治，而南朝则基本上回归到皇权政治。然而南朝皇权政治的回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持续进行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东晋的灭亡和刘宋的建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除此之外，宋孝武帝朝的政治变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早期经典文本的形成、流变及其学术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ZD252）阶段性成果。

^①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革也是南朝政治转变的关键，它的政治意义或许并不下于晋宋之变，所以历来学者多有论述^①。

将宋文帝与宋孝武帝朝的政局稍作比较，便能发现二者的不同。宋文帝即位之初，内政由徐羨之、傅亮把持，荆州、南兖州重镇由谢晦、檀道济掌控，四人据此“以制持朝廷”^②，这种权力结构与东晋门阀政治如出一辙。宋文帝诛杀徐、傅、谢三人之后，荆州重镇改由皇弟皇子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上游重镇对建康的军事威胁。中朝权力则颇为复杂，最初由高门士族王弘担任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独揽大权。身为外姓而掌此大权，王弘与宋文帝皆不自安，中朝权力便转移至彭城王刘义康之手。义康权力过盛，乃至与宋文帝相颉颃，最终被废黜。此后，文帝皆用数人共掌机密，最初为沈演之、庾炳之、范晔，后为江湛、何瑀之，后为江湛与徐湛之^③。由此可见，宋文帝朝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不过重要州镇改由宗室担任，中朝权力改由数名士族掌控，以相互制衡。宋文帝是在竭力维持皇帝、宗室、士族三种势力之间的平衡。

宋孝武帝即位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孝武帝并不信任宗室与高门士族，他企图建立帝王专制的政权，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朝的权力结构。在州郡方面，孝武帝割裂荆、扬二州以削弱州镇力量，尤其是分割荆州，极大地削弱了上游州郡对建康的军事威胁，改变了东晋以来的州镇格局。在中朝权力方面，一是省去录尚书事之职，二是设置两名吏部尚书，从官制上削弱宗室、大臣之权。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改革，除此之外，孝武帝又以寒人亲信为典签、中书舍人等小官，侵夺宰相之权。如此一来，便造成“南朝官制名实不符，高官如宰相、领军，有名而无实权，低官如舍人、制局监无名而有重权”^④，而这正是“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20页）。这种君主专制的政治格局在齐梁以后更加坚固，而这一格局的形成，实自宋孝武帝始。孝武帝死后，某些具体措施虽被修正（重置录尚书事，吏部尚书改为一人），但加强君主专制的意识、“寒人掌机要”的政策没变，且得到进一步深化。宋明帝时，幸臣之权远超孝武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执权柄，亚于人主。巢（尚之）、戴（法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⑤。直至齐武帝、梁武帝，仍以寒幸、次等士族掌握政治大权。总之，宋孝武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朝的政治权力结构，是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的关键。

除政治变革外，宋孝武帝朝的文化变革也值得重视。刘裕代晋造宋，从门阀士族手中夺取了政治、军事权力，然而在社会、文化上，门阀士族依然具有超越皇权的力量。刘裕出身低微，文化浅薄，与郑鲜之清谈被驳难至“变色动容”^⑥，由于文学才能低下而由谢晦代为作诗，由于书法不佳而专写大字以藏拙^⑦。与之相反，高门士族则在文化上占据绝对优势。刘裕企图代晋，需要获得门阀士族的支持，则其自身必须尊重甚至迎合士族文化。史称“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⑧，原

① 古人论述如沈约《宋书》（修订本）卷九四《恩幸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8册，第2527—2528页）、萧子显《南齐书》（修订本）卷五六《幸臣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册，第1075—1076页）、李延寿《南史》卷七七《恩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914页）、裴子野《宋略·总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册，第423页）、王夫之《读通鉴论》（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册，第581—582页）等，当代学者论述如严耀中《评孝武帝及其政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何德章《宋孝武帝上台与南朝寒人之得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赫兆丰《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中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等。

② 《宋书》（修订本）卷四四《谢晦传》，第5册，第1474页。

③ 参见《宋书》（修订本）卷七一《徐湛之传》，第6册，第2020页。

④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⑤ 《宋书》（修订本）卷九四《恩幸传》，第8册，第2540页。

⑥⑧ 《宋书》（修订本）卷六四《郑鲜之传》，第6册，第1856页。

⑦ 关于刘裕文化素养之浅薄，参见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修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因或在于此。有学者称“‘宋武爱文’是被动地‘爱文’”^①，确实较有见地。因此，尽管刘裕文化修养相当浅薄，却仍表现出对清谈与文学的极高热情，其背后的政治意味较浓。

刘宋建立三四十年后，皇室的文化修养也在逐渐提高。宗室第一代文化修养之浅薄已如前述，至第二代，好文之风逐渐兴盛。如宋武帝第二子义真，“聪明爱文义”^②，与谢灵运、颜延之等人友善。第三子宋文帝自称“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③，且善书法^④。第五子义恭亦“涉猎文义”^⑤，并有诗文存世。长沙王刘道怜第二子义庆“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以致“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⑥。至第三代，爱好文学已成风气。文帝第二子浚、第三子骏、第四子铄、第七子宏、第九子昶、第十一子彧、第十二子休仁等皆爱好文义^⑦。宋武帝刘裕的文化修养很低，“颇慕风流”中的“慕”字，表现出刘裕对士族文化的欣羨、仰慕之情。宋文帝的文化修养有所提高，从他于谢灵运、颜延之等人的交往、对话来看，大致能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士族文化。至孝武帝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较于宋武帝、文帝，孝武帝的文学修养大为提高，《南史》称其“读书七行俱下，才藻甚美”^⑧。元嘉二十六年（449）宋文帝“幸丹徒，谒京陵”^⑨，时为武陵王的刘骏献上《巡幸旧宫颂》十二章^⑩，辞藻华美。大明六年（462）殷淑妃薨，孝武帝作《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文辞凄怆。此外，《幸中兴堂钱江夏王诗》有“阴云掩欢绪，江山起别心”^⑪的精巧之句，《咏史诗》颇多慷慨纵横之气，另有《游覆舟山诗》《登作乐山诗》《登鲁山诗》等写景状物之作。总的来看，孝武帝的文学才能在刘宋帝王之中可以称冠，并且不下于一般士族。当然，较之于谢庄、鲍照等士族中的一流文人，宋孝武帝的文学才能自然是不如的。然而孝武帝身为一国之君，对其文学才能极为自负，想要超越士族，在文化方面称尊。今存《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一首，全诗如下：

九官盛事予疏纡（帝），三辅务根诚难亮（扬州刺史江夏王义恭）。策拙粉乡惭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诞），折冲莫效兴民谤（领军将军元景）。侍禁卫储恩逾量（太子右率畅），臣谬叨宠九流旷（吏部尚书庄）。喉唇废职方思让（侍中偃），明笔直绳天威谅（御史中丞颜师伯）。（《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五，中册，第1224页）

《柏梁台诗》相传为汉武帝于柏梁台上与群臣联句而成，顾炎武《日知录》指出其为后人拟作，近现代学者对诗之真伪、写作时间颇有争论^⑫。《柏梁台诗》所述汉武帝与群臣联句赋诗之事或非事实，然

① 李磊《义熙政局与“宋氏以文章闲业”之缘起》，《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

② 《宋书》（修订本）卷六一《武三王传》，第6册，第1788页。

③ 《宋书》（修订本）卷九五《索虏传》，第8册，第2570页。

④ 《南齐书》载：“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又载王僧虔论书云：“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南齐书》[修订本]卷三三《王僧虔传》，第2册，第660—661页）

⑤ 《宋书》（修订本）卷六一《武三王传》，第6册，第1793页。

⑥ 《宋书》（修订本）卷五一《宗室传》，第5册，第1609—1610页。

⑦ 参见《宋书》（修订本）卷九九《二凶传》（第8册，第2675页）、卷八《明帝纪》（第1册，第186页）、卷七二《文九王传》（第6册，第2047页），《南史》卷一四《宋宗室及诸王传下》（第2册，第403页），魏收《魏书》（修订本）卷五九《刘昶传》（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4册，第1429页）。

⑧ 《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1册，第55页。

⑨ 《宋书》（修订本）卷五《文帝纪》，第1册，第103页。

⑩ 严可均《全宋文》据《艺文类聚》辑得第四（半章）、六、八章，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全文十二章（参见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4—115页）。

⑪ 逯钦立辑校《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册，第1221页。

⑫ 参见孙正军《〈柏梁台诗〉成篇时间新论——基于文本出处和官职描述的综合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而这种诗歌形式确实能够体现帝王政治上的权威与文化上的雅致。孝武帝即位后不久^①，于华林都亭举行曲水宴，与谢庄等人仿效柏梁体联句赋诗。孝武帝起句曰“九宫盛事予疏纡”，确有豪迈、自负的帝王之气，显示了皇帝对朝政、宴会的主导和掌控。彭城王刘义恭、吏部尚书谢庄等人结合自己的职位，表达忠于职守的决心、未能尽职的惭愧以及对皇帝隆恩的感激和愧疚。这种仿效柏梁体联句作诗的行为，显示了皇帝的绝对权威，以及臣子对皇权的服从，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此外，仿效柏梁体联句赋诗又是一种文化活动，它显示了孝武帝对汉武盛世的欣羨，而宫廷文学^②正是在汉武帝时达到第一个高潮。东晋之时，皇权旁落，无力干预士族文化。与此同时，高门士族以门阀政治为依托，形成了适应于门阀士族的文化交往方式，这种文化及生活方式超越皇权，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封闭性，所以东晋一朝极少宫廷文学之作^③。入宋以后，门阀政治逐渐衰微，士族的政治、军事势力大为减弱，但这种稳定、封闭性的士族文化仍得以延续，并且与门第观念结合，常常凌驾于皇权之上^④。孝武帝即位后，便想要改变这一状况，加强对士族文化的领导与掌控，《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正反映了孝武帝的这一努力。

此外，据《宋书·临川王义庆传》附《鲍照传》载：“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⑤《南齐书·王僧虔传》载：“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⑥孝武帝欲在文学、书法方面称尊，士族虽然在文化上超越帝王，但畏于皇权之逼，不得不厚自贬损以保全性命。由此可以想见，孝武帝欲在文化上称尊的意志是何等强烈，而士族面对皇权之逼又是何等的恐惧卑微。从宋武帝到宋文帝朝，高门士族在政治、军事方面势力大减，在文化上却一直保持着超越皇权的优势地位。然而到了宋孝武帝朝，这种优势地位不得不以被动的形式逐渐失去，高门士族必须在文化上向孝武帝俯首称臣。

综上所述，孝武帝朝实为南朝政治、文化变革之关键，亦为南朝皇权与士权此消彼长、激烈冲突之关键。政治上，皇帝起用寒人小官以夺取士族高官之权，士族成为位高而无权的帝国官僚。文化上，皇帝以政治权力为后盾，试图在文化上超越士族。谢庄是孝武帝朝较为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抉择及文学创作，与孝武帝朝的政治、文化变革具有重要联系。

二 谢庄请辞吏部尚书的原因分析

谢庄出身于东晋南朝一流高门，其父谢弘微在宋文帝时颇受重用，与王华、王昙首等号曰“五臣”。谢庄大概于元嘉十七年（440）以始兴王浚法曹行参军起家（此年始兴王“置佐领兵”，谢庄二十岁），此后转为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太子中舍人，大致于元嘉二十年（443）转为庐陵王绍南中郎谘议参军（此年庐陵王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谢庄二十三岁），又转为随王诞谘议参军，至元嘉二十九年（452）转为太子中庶子，由地方军府进入朝廷任职。

谢庄一生之转折是在元嘉三十年（453）。其年二月，太子刘劭弑宋文帝而自立，江州刺史武陵王

① 此事发生在孝建二年十月左右（参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51页）。

② 本文以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中的“宫廷文学”概念为主，结合其他学者的观点，将宫廷文学界定为：以帝王的宫廷为中心，由帝王本人及其御用文人、朝廷大臣创作的，主要描写宫廷生活，用以歌功颂德、点缀太平、娱乐享受的文学作品。

③ 参见何诗海《东晋应制诗之萧条及其文学史意蕴》，《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

④ 谢灵运、范晔皆以门第和文化优势倨傲于宋文帝，被文帝所杀。王僧达自负门第，上表时“文旨抑扬”，被免官。高门士族的门第优越感往往联系着文化优越感，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专制皇权的挑战。

⑤ 《宋书》（修订本）卷五一《宗室传》，第5册，第1612页。

⑥ 《南齐书》（修订本）卷三三《王僧虔传》，第2册，第656页。

骏率众入讨。当时刘劭以谢庄为司徒左长史，而武陵王骏“密送檄书与庄，令加改治宣布”^①。于时何去何从，众人并非毫无犹豫^②。谢庄身在建康，毅然附同刘骏，并遣腹心门生到江州表明诚心。刘骏称帝后，随即以谢庄为侍中，次年迁左卫将军，拜吏部尚书。此前，谢庄如一般高门士族“平流进取”，最高做过太子中庶子，官五品；而一二年间，迁侍中、吏部尚书，为三品高官，且皆为清贵之职。谢庄时年三十四，可谓早达。

孝建元年（454），谢庄代颜竣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掌管士人起家和官吏任免、升降、调动等事务，位高权重，被视为美职。然而据《宋书·天文志》载：“孝建元年十月乙丑，荧惑犯进贤星。吏部尚书谢庄表解职，不许。”^③可知，谢庄拜吏部尚书之后不到一年，便上表解职。此外，谢庄又致书于江夏王义恭以求解职，称“下官新岁便三十五”^④，则知此文亦作于孝建元年。又称“前时曾启愿三吴”，“入年便当更申前请，以死自固”^⑤，可知孝建年间谢庄的确多次以疾辞官，甚至不惜以死相逼。孝建三年（456），谢庄由于辞疾过多，被免官。在短短两三年内，如此频繁地因病^⑥以求解职，乃至以死相逼，确实值得注意。孙明君《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对此有所发覆，以为：“作为吏部尚书的谢庄‘意多不行’，‘唯奉行文书’而已，况且当朝皇帝宠爱寒人、打压士族阶层，士族们在皇帝的淫威下度日如年，是以身患痼疾的谢庄下定决心要辞去处在聚光灯下的吏部尚书一职。”^⑦此说确为有识，然犹有未尽，谢庄以疾辞职一事，实与孝武帝厉行的一系列政策有关，亦关乎南朝政局之大变，故此处稍作申发。

如前所述，宋孝武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在内朝、外镇两个方面进行了大力的改革。内朝方面，以省去录尚书事和设立两名吏部尚书这样的制度改革最为重要。《宋书·百官志上》载：“录尚书职不总……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权外假，省录。”^⑧同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义恭希旨，乃上表省录尚书。”^⑨《宋书·孝武帝纪》载：“（孝建元年六月）戊子，省录尚书事。”^⑩据此可知：其一，孝武帝即位不久便欲收臣下之权，这种意志较为强烈，故为臣下所知；其二，省录尚书事是由在任者江夏王义恭主动上表提出的，故得施行。除录尚书事外，吏部尚书亦有重权，孝武帝对此有所忌惮，颇为忧虑^⑪。而吏部尚书原本与录尚书事共同商定选任事宜^⑫，录尚书已省，则选举重权归于吏

① 《宋书》（修订本）卷八五《谢庄传》，第8册，第2380页。

② 《宋书》载：“三十年，元凶弑立，世祖入讨，普檄诸州郡，又符郡发兵，僧达未知所从。”（《宋书》[修订本]卷七五《王僧达传》，第7册，第2136页）

③ 《宋书》（修订本）卷二六《天文志四》，第3册，第819页。

④⑤ 《宋书》（修订本）卷八五《谢庄传》，第8册，第2384页。

⑥ 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紧急护理科主任大卫·J·奥班认为谢庄患有遗传性的内分泌紊乱症状，可能最终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慢性心力衰竭、肝充血以及末期肾病（参见陈美丽著，贾骄阳译《高门与孤寒：南朝谢氏族人的升沉》，《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⑦ 孙明君《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⑧ 《宋书》（修订本）卷三九《百官志上》，第4册，第1339页。

⑨ 《宋书》（修订本）卷六一《武三王传》，第6册，第1799页。

⑩ 《宋书》（修订本）卷六《孝武帝纪》，第1册，第125页。

⑪ 参见《宋书》（修订本）卷八五《谢庄传》（第8册，第2385页）、卷八四《孔凯传》（第7册，第2363页）。孙明君《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论之甚明，亦可参见。

⑫ 《宋书·谢庄传》载：“（孝武帝）别诏太宰江夏王义恭曰：‘……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良以一人之识，不办洽通。’”（《宋书》[修订本]卷八五《谢庄传》，第8册，第2386页）《宋书·蔡廓传》载：“征为吏部尚书。廓因北地傅隆问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语录尚书徐羨之，羨之曰：‘黄门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复厝怀；自此以上，故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也。’遂不拜。”（《宋书》[修订本]卷五七《蔡廓传》，第5册，第1714页）可知吏部尚书与录尚书事共掌选事。

部尚书一人之手，其权势不言自明。分置吏部尚书时在大明二年（458），孝武帝与江夏王义恭解释：“自中分荆、扬，于时便有意于此，正诤改革不少，容生骇惑。尔来多年，欲至岁下处分，会何偃致故，应有亲人，故近因此施行。”^①“中分荆、扬”时在孝建元年六月，可知孝建元年孝武帝便有分置两名吏部尚书之意。孝武帝欲省录尚书，江夏王义恭便“希旨”上表请省；欲分置两名吏部尚书，谢庄焉能不知？谢庄此年因天文之变上表解职，又因病致书于江夏王义恭求解选职，当与此相关。“尔来多年，欲至岁下处分”，说明孝武帝一直没有打消这一念头，所以孝建年间，谢庄不断上表解职。

孝建年间实为南朝“寒人掌机要”的起始期，这一政治转变对吏部尚书谢庄的影响尤其巨大。赵翼指出“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②，然而这一变化实自宋孝武帝孝建年间开始，故《宋书·恩幸传》云“孝建、泰始，主威独运”^③。在孝建元年谢庄接任以前，吏部尚书一直都是重要的实权职位。宋文帝一朝，任吏部尚书者有王惠、王球、何尚之、庾炳之、萧思话、沈演之等人，他们或“性好举才，申济屈滞”^④，或“领选既不辑众论，又颇通货贿”^⑤，皆掌实权。至于谢庄的前任颜竣，也是“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⑥，而谢庄则是“意多不行”。实际上，正是从谢庄担任吏部尚书开始，宋孝武帝才“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戴）法兴、（巢）尚之参怀”，导致“法兴、（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⑦。也就是说，在孝建元年谢庄任职以后，吏部尚书开始由实权职位变为虚衔，而众人仍按以前的状况来要求谢庄，这无疑会使在位而无权的谢庄遭受较大的舆论压力（参见《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在下承受众人的非议，在上受到孝武帝的提防、猜忌，所以谢庄就任不久便以天文异常而求解职，又因病辞官，甚至以死相请。孙明君认为：“作为堂堂吏部尚书的谢庄，只是一个‘意多不行’而‘唯奉行文书’的傀儡角色，他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了宾客们的怀疑。我们相信，这才是谢庄不愿居选部的根本原因。”（《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孙氏所言固然有理，但从孝武帝对吏部尚书一职的忌惮与防范，以及江夏王义恭迫于孝武帝之逼而主动请求省去录尚书一事来看，谢庄孝建年间屡次辞任吏部尚书，主要还是迫于孝武帝的皇权之逼，想要远离权势之位、疑忌之职，以明哲保身。

此外，皇权与士权之间的冲突至宋孝武帝时尤为激烈，孝武帝朝拉开了南朝“恐怖政治”的序幕^⑧。宋文帝朝，徐羨之等人由于把控政权、“制持朝廷”而被杀，谢灵运、范晔等人以谋反大罪而被杀，但士族仍旧享受较高的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⑨。而孝武帝不仅以多种手段收回或打压士族权力，而且肆意杀伐，“睚眦之间，动至罪戮”^⑩。门第一流的王僧达由于“不逊”“终无悛心”而被借故杀

① 《宋书》（修订本）卷五八《谢庄传》，第8册，第2387页。

② 赵翼撰，曹光甫点校《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153页。

③ 《宋书》（修订本）卷九四《恩幸传》，第8册，第2528页。另有学者的研究可为佐证，参见王铿《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该文对宋齐二朝皇帝和大臣、寒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文帝一朝，是重用大臣的一朝，寒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而宋孝武帝则起用戴法兴、戴明宝等人。

④ 《宋书》（修订本）卷六三《沈演之传》，第6册，第1844页。

⑤ 《宋书》（修订本）卷五三《庾炳之传》，第5册，第1656页。

⑥ 《宋书》（修订本）卷七五《颜竣传》，第7册，第2144页。

⑦ 《宋书》（修订本）卷九四《恩幸传》，第8册，第2529—2530页。

⑧ 参见陶希圣《南朝士族之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上）》，《食货杂志》1974年第7期。

⑨ 宋文帝朝，仍有许多高门士族得以参政议政，具有较高的政治权力（参见《南朝士族之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上）》《论南朝宋齐时期的“寒人典掌机要”》）。

⑩ 《宋书》（修订本）卷九四《恩幸传》，第8册，第2529页。

害，极受信任的颜竣由于谏争恳切、议论人主得失而被孝武帝所杀。以上两人尚且是被以谋逆罪名处死的，周朗则是由于上书指斥时弊而得罪孝武帝，被冠以“居丧无礼”的罪名而被加害；羊戎则由于“与王僧达谤议时政，赐死”^①；沈怀文多次触怒孝武帝，最终也因为免官禁锢后卖宅还乡而被杀。正是由于孝武帝异常残暴、肆意杀戮，致使江智渊忧惧而死，江夏王义恭、柳元景等人虽居高位而常虑祸及，直至孝武帝薨方才庆幸免于横死。除此以外，孝武帝经常对群臣进行言语和身体上的凌辱，这对士族的人格也是极大的侮辱^②。总而言之，孝武帝采取非常极端的措施来收归臣下之权，急切地想要树立皇帝权威而对士族进行过于严厉的打压，使得帝王与士族之间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因此，孝武帝朝的恐怖气氛远超宋文帝时，士族在皇帝面前丢失了政治权力和应有的尊严，且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命危险。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顺从皇帝、远离权威，是比较高明的做法。孝建三年被免职之后，谢庄于大明元年（457）起为都官尚书。次年，置吏部尚书二人，谢庄与顾凯之并补选职。吏部尚书既置二人，则其权力、职责皆分半，谢庄任此职，也可以视为与孝武帝达成和解。大明年间，谢庄屡居高位，但已无政绩可言，亦不像孝建初年那样建言献策。孝武帝每宴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并令大臣互相嘲戏，沈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调，被孝武帝所忌恨。谢庄谓沈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③可知谢庄处于孝武一朝，不过与世俯仰，保全求生而已。可知，谢庄于孝建初年反复请求解除吏部尚书一职，于大明年间不关心政事、明哲保身，根本原因在于孝武帝朝的政治变革。谢庄的政治选择，当被置于南朝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变化中来观照。它反映了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败退。尽管谢庄在政治上尽量远离实权，但在文学上却有意靠近帝王，成为宋孝武帝朝宫廷文学之首。

三 谢庄的宫廷文学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谢庄年少便以文学著名，七岁能作文，二十五岁被范晔称赞于文字声韵“最有其分”^④。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李孝伯向张淹访问谢庄及王徽，更可见其声名远播。元嘉二十九年（谢庄三十二岁）以前，谢庄主要担任外镇藩王的僚佐，仅在元嘉十七年至二十年（谢庄二十至二十三岁）担任过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等职（在此期间还做过始兴王行参军和庐陵王文学）。长期的外任经历为谢庄游历山水提供了条件，使他写下了《游豫章西观洪崖井诗》《自浔阳至都集道里名为诗》《怀园引》等山水之作；而在朝廷任职的时间很短，且职位低、年龄小，因此很难参与到宫廷文学写作当中。直到元嘉二十九年，谢庄才以太子中庶子的身份参与宫廷文学写作，但也仅有《赤鸚鵡赋应诏》《侍宴蒜山》存世。然而谢庄此前已被范晔所知，名声传于北魏，可知他已经创造了较多的文学作品。由此可以推断，谢庄在宋文帝朝的创作应当主要是山水题材，宫廷文学作品不会很多。然而到了宋孝武帝时代，谢庄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作品，并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

谢庄现存的宫廷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在游览、节日、礼仪、宴会等场合的应诏之作，如《侍宴蒜山诗》《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侍东耕诗》；二是贡物、祥瑞题材写作，如《舞马赋应诏》《和元日雪花应诏诗》《瑞雪吟》；三是为皇室重要人物所作的哀策铭谏等文，如《宋孝武宣贵妃谏》《豫章长公主墓志铭》；四是郊庙歌辞，如《宋明堂歌》。谢庄现存诗歌十六首，其中宫廷文

① 《宋书》（修订本）卷五四《羊玄保传》，第5册，第1676页。

② 参见李磊《六朝士风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210页。

③ 《宋书》（修订本）卷八二《沈怀文传》，第7册，第2309页。

④ 《宋书》（修订本）卷六九《范晔传》，第6册，第2001页。

学之作八首；赋四篇，其中应诏之作两篇；诔两篇、哀策两篇，皆为应诏之作。总的来看，宫廷文学作品在谢庄现存作品中占据很大比重。谢庄的宫廷文学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大多比较重要。如受诏所作的《宋明堂歌》，与宋孝武帝“制礼作乐”的举措相关^①；《舞马赋》将“文学书写与现实政治话语结合”^②，满足了孝武帝自我夸饰的需要；《宋孝武帝宣贵妃诔》极得孝武帝喜爱，乃至“起坐流涕”，并且“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③。此外，皇太子妃何氏薨，“皇帝伤总辇之掩彩，悼副衽之灭华”^④，命谢庄作哀策文；刘琨之死于竟陵王刘诞之乱，孝武帝亦使谢庄为之写作诔文。总而言之，谢庄的宫廷文学写作，题材、场合丰富多样，或为《舞马赋》这种国家层面的宏大主题，或为《瑞雪吟》《和元日雪花应诏诗》之类为满足皇帝虚荣心而写的祥瑞文字，或为《宋孝武宣贵妃诔》这种与皇帝私人情感密切相关的文字。可以说，从国家层面到皇帝个人层面，从官方的、政治性的写作到非官方的、私人性的写作，谢庄都参与其中。如此种类繁多且意义重大的写作，表明谢庄成为宋孝武帝朝当之无愧的宫廷大手笔。裴子野《宋略·总论》谓孝武帝朝“一时之风流领袖，则谢庄、何偃、王彧、蔡兴宗、袁颢、袁粲”^⑤，将谢庄置于“风流领袖”之首，也可说明谢庄的宫廷文学地位。

谢庄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作品，成为宋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在南朝文学史上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标志着南朝高门士族在政治上败退之后，在文化（主要是文学）上的进一步败退；其二，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由山水文学向宫廷文学转变。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平行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力，在文化上更是超越帝室。刘裕代晋造宋，高门士族的政治、军事权力有所衰弱，但在文化上仍旧可以睥睨刘宋皇室。典型代表如出身于一流高门的谢灵运，他的家族（尤其是他的祖父谢玄）在东晋立下了赫赫大功，谢灵运的政治目标是建立其祖上一般的功业，然而在刘宋新朝，他的抱负注定无法实现。在宋文帝朝，谢灵运“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⑥，说明宋文帝不愿谢灵运插手政事，只是想让他做一名宫廷侍从文人，但这显然不符合他的预期。元嘉十年之内，谢灵运仅有《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一首应制诗存世。此诗在称赞皇帝、颂扬盛世之后，结尾称“顾己枉维繫，抚志惭场苗。工拙各所宜，终以反林巢。曾是萦旧想，览物奏长谣”^⑦，表达了辞官归隐的想法，并且是长久以来的“旧想”。在从游的公共场合以及应诏诗这一政治性较强的文体中，表达辞官归隐的请求，确实较为少见，这表明谢灵运并不愿意充当宋文帝的侍从文人。谢灵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然而在经济和文化上，他有足够的自负的资本，所以他拒绝了宫廷文人的身份，“终以反林巢”，创作了大量表现士族优越意识的山水作品。

代替谢灵运担任宫廷大手笔的是颜延之。在文学才能上，颜、谢二人不相伯仲，然而在家世门第上，二人不可同日而语。谢灵运在《述祖德诗》《撰征赋》等作品中反复称颂其祖上功德，称谢氏为“冠族”（《谢灵运集校注》，第19页）、“华宗”（《谢灵运集校注》，第7页）。颜延之父、祖官位皆不显达，骂其子颜竣“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⑧，颜竣自称“东州凡鄙，生于微族，长自闾阎，不

① 参见李晓红《“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林晓光《六朝宫廷贡物与贵族文学——从夷方珍奇到皇朝符瑞》，《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③ 《南史》卷一一《后妃传上》，第2册，第324页。

④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五，第4册，第500页。

⑤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五三，第5册，第423页。

⑥ 《宋书》（修订本）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938页。

⑦ 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⑧ 《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第3册，第881页。

窥官辙，门无富贵，志绝华伍”^①，皆可见颜氏门第之低。宋文帝在选择宫廷文人时，首选其实是一流门第的谢灵运，由谢灵运在公开场合写作颂扬皇帝、自我贬低的宫廷文学作品，更能显示士族身份的卑微与皇帝权威的强盛。谢灵运拒绝担任纯粹的宫廷文人，显示出高门士族在文化上不向帝王低头的傲气，而门第较低的颜延之则做出妥协，在政治、文化两方面向皇帝俯首称臣。

除颜延之外，在宋文帝朝大量写作宫廷文学的士族文人并不多，有的高门士族并不甘心充当侍从文人。比如范晔，出身于顺阳高门，其父范泰仕至左光禄大夫、特进。范晔自幼好学，经史、文学、书法、音律皆善，无论是门第还是文化，都堪称上流士族。范晔今存《乐游应诏诗》一首，乃元嘉十一年（434）宋文帝裸饮于乐游苑，普诏群臣所作。除此之外，范晔别无应诏诗存世。范晔自称：“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②可见范晔对其文才极为自信，但是他更想写作的是“事外远致”之文，而非“公家之言”。所谓“公家之言”，应当包括《乐游应诏诗》之类宫廷文学作品在内。除文学外，范晔也不愿以音乐侍奉皇帝。范晔善弹琵琶，宋文帝多次暗示范晔为其弹奏，范晔假装不知，只有宋文帝亲自歌唱，范晔才为之弹奏，文帝歌毕，范晔便不再弹奏。这表明，范晔并不愿以文学、音乐才华侍奉文帝，显示出高门士族在文化和人格上的倨傲。

总之，宋文帝朝除了颜延之大量写作宫廷文学之外，高门士族如谢灵运、范晔等并不热心于此。到了宋孝武帝朝，谢庄取代颜延之，创作了大量重要的宫廷文学作品。谢庄出身于一流高门，并且担任吏部尚书等高官，他的门第、官位远远高于颜延之，也高于范晔。除谢庄外，鲍照也生活于孝武帝朝。孝建初，鲍照一度进入宫廷，献《中兴歌》十首^③；孝武帝自以为文章无人能及，鲍照故意写作鄙言累句，说明鲍照极愿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文人。尽管如此，鲍照很快就被外放为秣陵令，远离宫廷文学圈。鲍照的文学才能并不低于谢庄，但“才秀人微”^④，他的门第比颜延之还差，与谢庄更不可同日而语。孝武帝之所以选择谢庄作为宫廷大手笔，除了谢庄文采华美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门第一流。因此，谢庄成为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表明高门士族开始在文化上向皇帝妥协、俯首（将之与同族的谢灵运相比，结论显然）。谢庄《和元日雪花应诏诗》结尾称“泽厚见身末，恩逾悟生眇”^⑤，将皇帝的泽厚恩深与自身的渺小卑微相比照，表现个人对皇帝的依附和感恩；《烝斋应诏诗》中“观生识幸渥，睇服惭轸吝”^⑥亦为此意。总之，谢庄以一种匍匐、谄媚的姿态进行宫廷文学写作，甘当孝武帝的侍从文人，标志着南朝高门士族在政治上败退之后，在文化上的进一步败退。

南朝初期的士族文学，可以大体分为山水文学和宫廷文学^⑦。前者以谢灵运为代表，体现了鲜明而优越的士族意识；后者以颜延之为代表，体现了士族对皇权的臣服。谢庄成为宋孝武帝朝的宫廷大手笔，标志着高门士族在文化上的败退，也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的重要转变：宫廷文学逐渐压倒山水文学，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如前所述，宋文帝朝除了颜延之以外，大量写作宫廷文学的士族并

① 《宋书》（修订本）卷七五《颜竣传》，第7册，第2148页。

② 《宋书》（修订本）卷六九《范晔传》，第6册，第2001页。

③ 吴丕绩先生《鲍照年谱》据《宋书·孝武帝纪》载元嘉三十年五月克京城，改新亭为中兴亭，认为《中兴歌》作于此时，为颂赞孝武帝而作。钱仲联先生否定了这一观点，认为“歌中无一语及孝武讨逆事，仍以颂文帝为近”。按，当以吴说近是，写作时间当在元嘉三十年至孝建年间（参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284—285页）。

④ 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下册，第381页。

⑤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六，中册，第1250页。

⑦ 孙明君将南朝士族文学分为山水文学与庙堂文学，为表述方便，本文以“宫廷文学”取代“庙堂文学”（参见孙明君《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不多，没有形成一股创作潮流^①。颜延之宫廷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及南朝宫廷文学的兴盛，实际上是从宋孝武帝朝开始的。现将宋文帝及孝武帝二朝的宫廷文学创作情况制表如下（参见[表1]）^②：

[表1]

	宋文帝朝	宋孝武帝朝
皇帝举行的文学雅集	1. 元嘉初，三月上巳，宋文帝举行曲水宴会，命释慧观及朝士赋诗。 2. 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楔饮于乐游苑，与会者赋诗。 3.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献赤鸚鵡，普诏群臣为赋。	1. 孝建二年，雅集作《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 2. 大明二年，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 3. 大明五年元日，花雪降殿庭，公卿并作花雪诗。 4. 孝武帝欢饮，普令群臣赋诗，逼令沈庆之作诗。
宫廷文学作家	1. 颜延之；2. 谢灵运；3. 范晔；4. 江夏王义恭；5. 武陵王骏；6. 袁淑；7. 谢庄；8. 王僧达；9. 张畅；10. 何承天；11. 沈演之；12. 鲍照。	1. 谢庄；2. 江夏王义恭；3. 鲍照；4. 殷琰；5. 颜竣；6. 江智渊；7. 徐爰；8. 张畅；9. 柳元景；10. 何偃；11. 颜师伯；12. 竟陵王诞；13. 沈庆之；14. 谢超宗；15. 丘灵鞠；16. 殷淡；17. 谢朓。
宫廷文学作品	颜延之十四首；谢灵运一首；范晔一首；江夏王义恭三首（2）；武陵王骏一首；袁淑一首（不存）；谢庄三首（1）；王僧达一首；张畅一首；何承天三首；沈演之二首；鲍照三首（2）。共三十四首。	谢庄十五首（3）；江夏王义恭四首（2）；鲍照三首（1）；殷琰一首；颜竣二首；江智渊一首；徐爰二首；沈庆之一首；谢超宗一首（不存）；丘灵鞠一首（不存）；殷淡一首；谢朓一首（不存）；佚名二首。共三十五首。

宋文帝朝共三十年，孝武帝朝不满十二年，然而无论是帝王雅集的次数，还是宫廷文学作品数量，孝武帝朝皆超过文帝朝，由此可见孝武一朝宫廷文学创作之盛。除此之外，另有二事可为佐证。一是宋孝武帝模仿相传为汉武帝召集群臣所作的柏梁体诗，这在以前帝王中尚且未见，其后梁武帝、梁元帝皆有效仿。二是谢庄受孝武帝之命，采用“以数立言”的方式创作了《宋明堂歌》，这对南齐、北齐的雅乐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③。宋文帝朝比孝武帝朝多出近二十年，然而无论从作家、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学活动、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来看，孝武一朝都超过了宋文帝朝。因此可以说，南朝宫廷文学的兴盛始于宋孝武帝朝。

宫廷文学在宋孝武帝朝兴盛，也标志着南朝士族文学的重要转变：宫廷文学逐渐压倒山水文学，成为士族文学的主流。作此判断，主要依据有三：

其一，文人集会地点大体由地方山泽转移至宫廷庙堂。宋文帝朝，出镇藩王为文人的聚集提供

① 有学者指出“生活在元嘉中、后期的诗人莫不写颂美的应制诗”，并举谢庄、范晔、袁淑、鲍照为例，说明元嘉中、后期出现了以颜延之为代表的“时代性诗潮”。按，该说似有夸大之嫌，且谢庄、鲍照的许多应制诗写于宋孝武帝朝，范晔仅有一首应制诗存世，袁淑一首也没有，很难称之为“诗潮”（参见吴怀东《颜延之与一段被忽略的诗潮》，《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② 关于此表的若干情况，说明如下：一、同一作家于宋文帝、孝武帝朝都参与宫廷文学写作，则分别计数；二、同一作家同题作品有多首，仅按一首计数，如鲍照《中兴歌》十首仅计为一首；三、计算宫廷文学作品数量时，作家后面的数字表示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创作朝代存疑的作品数量；四、《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为联句诗，计为一首；五、宋文帝、孝武帝举行文学雅集的情况，主要参见罗建伦《宋孝武帝刘骏文学雅集述略》（《中国韵文学刊》2012年第4期）、《宋文帝刘义隆文学雅集述略》（《云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③ 参见《“以数立言”与九言之兴——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李晓红《南朝雅乐歌辞文体新变论析——以五帝歌为中心》，《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

了条件,促进了山水文学的创作。如临川王义庆出镇荆、江二州,召集大批文人,登山临水,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山水诗^①。此外,宋文帝朝尚有不少由士族主导的文人集会,如谢灵运与谢惠连、何长瑜等人“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②,这种山泽之游对山水文学的写作当有裨益。《水经注》载谢灵运与谢惠连常游若耶溪上,“作连句,题刻树侧”(转引自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第124页),可为明证;谢惠连《三月三日曲水集诗》写“携朋适郊野”所见山水景色,也可见“山泽之游”对山水文学写作的影响。此外,尚有徐湛之出镇南兖州之时修整广陵旧城,“招集文士,尽游玩之适,一时之盛也。时有沙门释惠休,善属文,辞采绮艳,湛之与之甚厚”^③,当亦有山水文学之作。由此可见,宋文帝朝的藩王和士族领袖为文人的聚集提供了条件,这种地方性的山泽之游对山水文学的写作当有很大推动。然而孝武帝欲削弱王侯,抑黜诸弟^④,孝武一朝再未出现如临川王义庆、庐陵王义真一般招集文士、与之周旋的藩王。此外,也少见如谢灵运、徐湛之一般聚集文士进行山水文学创作的情况。相反,孝武帝加强了对士族文人的吸纳,举行了频繁的宫廷集会与集体写作活动。从宋文帝到孝武帝,士族文人的聚集与写作场所,呈现出由地方山泽向宫廷庙堂集中的倾向。

其二,高门士族对宫廷文学创作态度的转变。如前所述,谢灵运放弃宫廷文学作家的身份而以山水诗著称;范晔有资格、有才能写作宫廷文学,却“耻作文士”,没有大量创作宫廷文学作品;以文才著名的袁淑自称要为宋文帝献上《封禅书》,结果不仅不见《封禅书》,反而留下了《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劝进笺》等明显含有讥讽帝王意味的作品。可知在宋文帝朝,尚有某些高门士族对宫廷文学创作并不热心,甚至稍有排斥。到了宋孝武帝时期,高门士族不再排斥宫廷文学创作,甚至有主动迎合的倾向。谢庄向孝武帝禀报其园林降下甘露,集花雪于衣,致使公卿并赋花雪诗,都显示出对孝武帝的迎合。除此之外,谢庄有意培养、展示其子谢朓的文学才能,谢朓也在孝武帝出游姑孰时受诏作《洞井赞》,深受孝武帝夸赞。另如谢灵运之孙谢超宗,因作宣贵妃诔而得孝武帝称赏,并成为大明、泰始年间宫廷文学创作的中坚人物。从灵运到超宗,亦可见高门士族态度之转变。

其三,创作风气的变化。《宋书》本传载,谢灵运自永嘉还居始宁,“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⑤,可见谢灵运山水诗在元嘉年间^⑥的盛行情况。与之相反,颜延之创作的辞藻绮丽、典故繁复的宫廷文学则被目为“错彩镂金”“雕缛满眼”。然而到了宋孝武帝大明年间,颜延之、谢庄的“繁复”风格影响甚大,“于时化之”,而谢灵运山水诗派则“江河日下”(参见《颜延之与刘宋宫廷文学》)。两相比较,可见孝武帝朝山水文学的式微与宫廷文学的兴盛。之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孝武帝对文学之士的赏爱和拔擢。江智渊由于文采斐然而被孝武帝“深相知待,恩礼冠朝”^⑦,受到特殊接待;丘灵鞠、丘巨源、檀超、谢超宗、殷淡、韩兰英皆

① 刘义庆出镇荆州时作《游鼇湖诗》,镇江州时有登山赋诗活动,吴丕绩认为鲍照《从登香炉峰诗》为元嘉十六年随从义庆登庐山所作,钱仲联、范子烨认为《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望孤石》诸诗也是此年所作(参见赵立学《南朝刘宋诗风演变研究——从文学交往活动的视角考察》,陕西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125页)。

② 《宋书》(修订本)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941页。

③ 《宋书》(修订本)卷七一《徐湛之传》,第6册,第2019页。

④ 参见《宋书》(修订本)卷六一《武三王传》(第6册,第1799页)、卷八二《沈怀文传》(第7册,第2309页)。

⑤ 《宋书》(修订本)卷六七《谢灵运传》,第6册,第1918页。

⑥ 谢灵运还居始宁时为宋少帝景平元年秋,但“修营别业”及山水诗的大量写作,当在宋文帝元嘉元年以后(参见《谢灵运集校注》,第428—433页)。

⑦ 《宋书》(修订本)卷五九《江智渊传》,第6册,第1758页。

因文才而被孝武帝所称赏或擢用^①。如此一来，当时形成了“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②的局面，这种“文采”当然更多的是指向宫廷文学之作。

宋孝武帝朝宫廷文学的兴盛，除了孝武帝的推崇、提倡以外，谢庄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首先，谢庄出身华贵，官位显达，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写作宫廷文学作品，受到孝武帝的称赞、提拔，对士族文人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次，谢庄宫廷文学写作的诸多艺术技巧，为其他士族文人提供了效仿的对象。颜延之创造了一种辞藻华美、典故繁复的写作手法，谢庄加以继承，并推波助澜，在孝武帝大明年间形成了兴盛一时的创作潮流。《诗品》所云“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诗品集注》[增订本]，上册，第228页），可为明证。前述谢庄所作《宋明堂歌》对南齐、北齐雅乐创作的影响，也是一例。另据《南史》载，谢庄为宣贵妃作哀策文，孝武帝“卧览读，起坐流涕曰：‘不谓当今复有此才。’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③。之所以“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一方面当然由于谢庄此文凄怆精美，另一方面也由于文章得到了孝武帝极高的赞赏^④。都下之人竞相传写此文，表明众人想要欣赏、学习谢庄的创作手法，或许也有借此获得孝武帝赏识的想法。除谢庄作《宣贵妃诔》之外，谢超宗“作诔奏之”^⑤，丘灵鞠“献挽歌诗三首”^⑥，殷琰作《宣贵妃诔》，江智渊作《宣贵妃挽歌》。由于文献不足，难以确知创作时间的先后，不过从谢庄的地位以及孝武帝多次命其写作诔文的情况来看，谢庄很有可能是最早写作宣贵妃诔之人；谢超宗、丘灵鞠等人当是受到谢庄的影响，才创作了诔文、挽歌，这与“都下传写，纸墨为之贵”的说法是契合的。总之，孝武帝朝宫廷文学大盛，谢庄对此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宋孝武帝之后，宫廷文学继续发展，齐梁之时已蔚然成风，宫廷文学遂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

余论：南朝皇权振兴与士族文学之演变

东晋时期，高门士族获得平行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力，这种门阀政治可以视为古代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到了南朝，这种“变态”的门阀政治逐渐向皇权政治回归。与之相应，帝王的权力逐步增强，士族的权力则趋于衰微。从东晋的门阀政治到南朝的皇权政治，士族从独立于皇权之外的门阀“贵族”，转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帝国官僚，这一变化对南朝士族的政治遭遇、政治选择、思想心态等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士族的聚集形式、文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以及文学创作的动机、题材、主旨、风格，推动了南朝士族文学的演变。

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宋孝武帝朝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孝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削弱臣下之权，使得南朝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孝武帝死后，这种专制意识及权力结构进一步深化，然而这种矫枉过正的权力调整，使得帝王与士族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其外在表现，便是宋、齐二朝频繁的政治动荡，以及大量士族被帝王所杀。梁武帝鉴于宋、齐二朝之乱，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手段来调整权力结构，皇权与士权重新达到平衡，而皇权已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陈朝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士族完全无力与帝王抗衡。总而言之，南朝皇权基本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当中，宋孝武帝和梁武帝是皇权振兴过程中的两个关键。

① 参见《南齐书》（修订本）卷五二《文学传》（第3册，第981、986、983页）、卷三六《谢超宗传》（第2册，第707页）、卷二〇《皇后传》（第2册，第438页），《宋书》（修订本）卷五九《殷琰传》（第6册，第1746页）。

② 《南史》卷二二《王俭传》，第2册，第595页。

③ 《南史》卷一一《后妃传上》，第2册，第324页。

④ 有学者认为，谢庄重除吏部尚书，“皆此一诔之功”（参见《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320页）。

⑤ 《南齐书》（修订本）卷三六《谢超宗传》，第2册，第707页。

⑥ 《南齐书》（修订本）卷五二《文学传》，第3册，第981页。

随着南朝皇权的逐渐回升，士族的政治、军事权力处于不断下降的过程当中。从身份上看，高门士族由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贵族”，逐渐演变为依附于皇权的帝国官僚；从行为上看，高门士族或主动或被动地退出政治舞台，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文化方面；从文化上看，高门士族由“文化贵族”^①逐渐转变为服务于帝王的宫廷侍从文人。刘宋初期，帝室的文化修养显然是低于门阀士族的，为了迎合、拉拢士族，刘裕不得不“被动地‘爱文’”。到了南朝后期，士族失去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不得不以文学才能取悦帝王^②，获取官位，也可以说是“被动地‘爱文’”。这种转变的关键原因，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以及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变化。

如上所述，宋孝武帝朝是南朝政治、文化变革的关键期。谢庄处于这一巨大变动之中，做出了比较明智的选择。宋初，谢庄族叔谢灵运欲“参时政”，而“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最终被杀。谢灵运的悲剧，在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门阀政治时代，不能适应皇权政治。谢庄所为与谢灵运正好相反，即避“时政”，唯以“文义”侍上。谢庄之子谢朓“有虚名”而无“治实”^③，梁武帝却大加拔擢，以之为侍中、司徒、尚书令。至梁武帝时，皇权极盛，士族亦自以空名居于朝廷。谢灵运、谢庄、谢朓三人之经历，正可见在南朝皇权振兴过程中，士族地位、处境之变化。而谢庄处于变革的关键期，能辞吏部尚书、以文学侍奉孝武，故得保全。孙明君认为谢庄不愿居选职的原因是“他不满当时的吏部尚书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傀儡，是故用辞职之举表达自己的抗议”，此举“显示出高门士族精英对孝武帝政治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抗争”（《谢庄〈与江夏王义恭笺〉释证》）。孙氏对谢庄辞选职的原因颇多精辟之见，然而似乎过高地夸赞了谢庄的精神气节。实际上，谢庄在大明之世心甘情愿地当了好几年“傀儡”，且谢庄谓沈怀文曰“卿每与人异，亦何可久”，可见谢庄不过欲保全性命而已。然而在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过程中，在门阀贵族向帝国官僚转化的过程中，谢庄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孝武朝以后，高门士族之选择多有如此，如徐孝嗣“爱好文学，赏托清胜。器量弘雅，不以权势自居，故见容建武之世。恭己自保，朝野以此称之”^④，与谢庄立身之道无异。

综上所述，宋孝武帝朝是南朝政治、文化变革的关键时期，而谢庄的政治抉择代表了高门士族由“贵族”向官僚、由政士向文士的转变，谢庄的文学创作则标志着宫廷文学逐渐成为南朝士族文学的主流。南朝皇权振兴以及帝王与士族权力关系的变化，对南朝士族文学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谢庄在宋孝武帝朝的政治抉择和文学创作，正是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

[作者简介] 何良五，湖北大学文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永明体声律的一种特殊形式——以沈约、谢朓为中心》等。

(责任编辑 李 科)

①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古贵族的根源和本质是作为纯粹文化的学问，即儒学和礼教（参见牟发松《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唐燮军称：“尽管沈约以文才为凭借的求仕方式，既不同于周盘龙的以军功起家，也有别于纪僧真的以吏干发迹，但他的政治取向与周、纪两人其实并无任何差别，并同样表现为对皇权的依附。”（唐燮军《诗人之外的沈约：对沈约思想与生平的文化考察》，《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除了沈约以外，齐梁时期还有大量凭借文才求得帝王赏识、获取官位的士族，文士手中的笔和将士手中的刀一样，都是取悦帝王的工具。

③ 姚思廉《梁书》（修订本）卷一六《王亮传》，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册，第300页。

④ 《南齐书》（修订本）卷四四《徐孝嗣传》，第3册，第859页。